

最低工资与人口调控的关系及深圳实践

杨光辉, 丁安安

(深圳大学 经济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60)

摘要: 利用最低工资制度可以对企业生产成本和劳动者工资进行调控, 进而发挥对人口、产业的联动调整作用。本文通过总结国内外最低工资制度与人口的调控经验, 从产业结构、劳动生产率、区域间博弈等角度来分析区域最低工资与人口调控的关系; 结合深圳的实际情况, 对最低工资与人口调控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证明最低工资调整与人口调控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并在人口或产业转型的不同阶段发挥不同作用。

关键词: 最低工资; 人口调控; 深圳经验

中图分类号: C924.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 (2012) 06-0065-0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imum Wage and Population Control and Shenzhen's Empirical

YANG Guang-hui, DING An-an

(School of Economic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nhance the minimum wage system that impacted on the adjustment of population and industrial's structure, and base on the adjustment empirical from home and abroad, discuss the relation of minimum wage adjustment with population control on view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labor productivity, regional game etc. Then according to the Shenzhen's experience, demonstrated that adjustment of minimum wage was closely related to population fluctuation, and raised minimum wage would played different role on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population or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minimum wage; population fluctuation; Shenzhen's experience

一、最低工资与人口调控的国内外经验

1. 国内外最低工资制度与调控实践

最低工资制度最早源于新西兰, 起初仅仅作为防止和解决产业纠纷的程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此后数十年, 发达国家相继通过最低工资的相关法律, 其使用范围不断扩大, 作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关于它的争论也一直在持续, 其中最大的争论在于最低工资是否会引起失业。除部分国家

收稿日期: 2012-05-21; 修订日期: 2012-09-11

作者简介: 杨光辉 (1963-), 湖南新邵人,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 经济与人口统计。

外，在主要发达国家并没有因实行最低工资标准导致大规模失业的情况。卢森堡的最低工资标准世界最高，但卢森堡却是欧洲失业率最低几国之一^①。

美国还在最低工资制度的帮助下摆脱了大萧条的经济危机。20 世纪 30 年代的美国实施了一系列新政，最低工资标准正是当时推出的《公平劳动标准法》中的一项内容。制度实施的结果表明，它提高了美国人的消费能力，实现了经济复苏，并获得了持续的繁荣；在 1938 年开始实施最低工资标准至 1948 年的十年内，美国失业率从 20% 下降至 4%^②。最低工资制度并没有增加失业，反而拉动了消费、刺激了生产，间接对人口产生积极的影响，比如增加就业人口、改善人力资本结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

日本早先的经济转型也有最低工资制度的功劳。20 世纪 50 年代末，日本经济粗放型增长的诸多问题日益凸显，如传统生产方式和现代市场经济并存的双重结构、过度依赖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人口红利即将结束等。1960 年的“工资翻番论”^③ 建议启动包括最低工资制度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规定在企业内部，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间的倍数严格限制在 6~8 倍。结果是劳动生产率得到大幅度提高，产业结构向高度化发展，双重结构得到缓和（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结构趋于平衡）。从 1955 年到 1970 年，日本国民平均收入上涨了两倍多，以蓝领和白领为代表的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渐渐缩小。1960~1970 年，日本的国民失业率平均仅为 1.23%，是日本失业率最低的 10 年，劳动者人口数量平均占总人口的 65.7%，是最高的 10 年^[1]。

我国最低工资制度实行几十年来，对于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水平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实施初期，由于制度不够完善，实际效果良莠不齐。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制度中的概念界定不明确、不合理，企业借机怠惰执行。2004 年 1 月 20 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2004 年第 21 号令颁布《最低工资规定》，扩大了最低工资的适用范围，将境内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纳入最低工资制度的适用范围，并明确规定了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将社会保险费用作为最低工资标准的考虑因素，并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至此，我国最低工资制度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 国内外最低工资实践启示

到目前为止，世界所有发达经济体都设定了最低工资标准。观察发达国家的最低工资历史，最低工资标准变化都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步。经济发展使得社会财富积累，就业率增加，最低工资标准也会相应提升，反之亦然。最低工资标准的实施，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加国民受教育年限，又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良性影响。

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制定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但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与区域相比其人口流动有很大的差别：区域人口的流动更敏感，也更易受经济变量的影响。因此，不同区域在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时，不仅要考虑自身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也要考虑周边及相关城市的经济承受力。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虽然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释放出来，但我国目前的劳动力供给并非是无限制供给，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在工资偏低的情况下，许多农民工不愿外出工作，因而出现了企业招工难的问题。这说明劳动力供给已经走出了无限供给阶段，只有提高工资，才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由于劳动力市场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买方垄断和摩擦，实施与经济协调的最低工资制度可以保护劳动者的权益，缓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现状，在对就业不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的情况下，提升底层劳动者的人

① 最低工资标准的比较根据欧洲统计局公布的 2009 年欧洲各国数据，失业率根据欧洲统计局发布的系列失业率数据归纳整理。

②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http://www.bls.gov/news.release/empst.toc.htm>, 2010-12-27。

③ 中山伊知郎于 1959 年 1 月 3 日在《读卖新闻》上提出“工资翻番论”，<http://www.zgjrw.com/News/2010719/home/026248596200.shtml>, 2010-07-19。

力资本投资能力，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二、最低工资与人口调控的关系

最低工资调整可引起企业成本的上涨，造成产业的调整升级，进而影响劳动人口的迁移流动；最低工资对居民生活成本造成影响，间接地推动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在本文的研究中，“人口调控”指城镇人口规模和结构的调控；而产业结构调整 and 劳动人口的迁移流动，则作为最低工资调整而导致人口调控过程中的传导因素来对待。

1. 从产业结构调整角度看

在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资金的有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合理的选择，并且能够为经济增长作出巨大贡献。但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价格低，如果不合理地进行产业升级，将造成产业结构失衡，制约经济发展。

工资标准偏低，使得不少企业满足于“低劳动力成本”优势，陷入“低技术陷阱”。厂家不愿意投资技术更新，提高工人素质；外商也宁愿多雇一些廉价工人，少用先进设备。正是由于依赖于低工资水平，我国制造业技术水平一直得不到提升。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来提高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用工成本，将迫使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引入技术革新，主动完成产业升级。而在产业升级调整中，一部分企业利用现有实力投资技术更新，提高工人素质，引进高端人才；一部分企业无法负担成本压力，被迫关闭、外迁，同时带走一批学历结构较低、人员流动性较强的从业人员，从而对人口规模和结构产生调控作用。

2. 从消费需求角度看

钱纳里认为，经济增长是生产结构转变的一个方面，生产结构的变化应适应需求的变化，应能更有效地对技术加以利用^[2]。在预见力不足和要素流动有限制的既定条件下，结构转变极有可能在非均衡的条件下发生，在要素市场尤其如此。根据这种观点，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一个产业结构问题，产业结构必须与需求相适应。如果说人工成本的上升推动着产业结构的调整，那么消费需求则直接拉动着产业结构的升级。比如，我国大力提倡发展第三产业但收效不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其他产业尤其是工业尚未全面进入高级化过程，人们的工资水平太低导致远未形成对第三产业的广泛需求。

因此，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将使城市低工资人群和农村进城打工者的收入状况得到改善，提高他们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能力，形成对第三产业的广泛需求，为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助力。

3. 从劳动生产率提高角度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了经济追赶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经济落后国人均收入和产业结构向发达国家逐步提升和逼近的“收敛”过程，也可以归结为劳动生产率持续较快增长或追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施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可使全社会的工资水平得到提高，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发展，加速经济追赶的步伐，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又可以节约劳动力，同时要求从业人员有更高的专业技能和素质。这样不但能优化劳动人口结构，而且能够解决当下中国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消失等诸多问题，从而起到间接调控人口的作用。

4. 从地区之间的博弈角度来看

最低工资存在区域差别，而这一差别使得最低工资制度具有区域间博弈性特点，就具体某地区来说，最低工资的制定，要考虑国家政策、周边城市发展、自身经济发展等多种制约因素，因此，最低工资的制定是一个当地政府与国家、其他地区相互博弈的过程。

首先，国家为保护劳动者利益制定最低工资，并且有强制性要求。其次，最低工资对本地经济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一方面，增加地区消费能力、调整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使得企业成本增加，利润减少，甚至外迁或倒闭，不合理的最低工资还会增加失业。如果最低工资在经济发展可承受

范围之内，则利大于弊，否则弊大于利。再次，最低工资制定受周边与其他地区的制约。地区发展不平衡，加之区域性的人口流动要远远敏感于国家间的人口流动，使得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不同于国家。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其最低工资只需设定在自身经济发展可承受范围之内，而对于一个地区来说，最低工资不但要考虑自身经济的承受能力，还要考虑周边其他城市经济的承受能力。

由于区域人口的流动性，每个城市的战略规划制定都不具有完全的独立性，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使得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既要考虑国家政策、本地发展，又要考虑周边地区发展的制约，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三、深圳市最低工资与人口调控实证分析

1. 深圳视角下的最低工资与人口调控

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是我国经济转型最早和经济扩张较快的地区之一，其最低工资制度与人口产业调整的实践对我国许多区域具有典型的示范作用。根据缪尔达尔-赫希曼的“扩散效应”，随着中心地区的形成和发展，周边地区会从中心地区获得资本、人才而带动自己的发展^[3]。当下深圳特区内产业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相关人口被扩散到特区外及周边地区。而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与提高，会加快扩散效应。因此，合理、合时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使得扩散的产业、人口能够被周边地区所吸纳，并反过来有益于深圳，是政府在经济转型和提升过程中应当考虑的政策手段。此外，深圳户籍与非户籍人口比重倒挂，非户籍人口更多，这使得最低工资一旦上涨，人口流动将更加敏感，人口从深圳迁回市外的力度更大。这会对周边地区产生一个不小的冲击。因此，深圳在制定最低工资时，不仅要考虑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还要考虑人口迁移、产业转移中涉及的周边及内陆地区的劳动力需求、产业承接的空间水平以及经济的发展情况。

最低工资变动所能调控的人口主要有四类（参见图1）。其中，A为直接因最低工资上涨而从外地迁入的人口，这部分劳动力大多教育程度不高、年龄偏低，就职于劳动密集型企业；B为间接受最低工资影响而迁入的人口，这部分人因产业升级而迁入，一般教育程度较高，以中青年居多，就职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C为本地被释放出来并迁出的人口，这部分人或被其他城市吸纳，或回乡，或因摩擦性失业而离开深圳；D为本地被释放出来但滞留在深圳的人口，这部分人在深圳因可能找到合适的发展机会而滞留，他们或拥有学历优势，或拥有技能优势，再就业机会较大。其中还有一部分人虽然滞留在深圳，但可能转入脱离政府法律法规约束、不向政府纳税的地下经济，或者从事非法传销、走私、贩毒等活动。由于四类人口特点各不相同，最低工资对这四类人口的调整关系也各不相同，具体情况如下：①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当最低工资达到平均工资的30%~40%时，对产业的升级调整效果才开始显现，因此，目前最低工资对B类人口的调控作用很小。②最低工资上涨将持续吸引A类人口，并会因成本提升而迁移出C类人口。③短期内，最低工资作用的主要是A、C两类人口，但这两类人口的学历都不高，A的迁入和C的迁出相抵销对深圳人口学历结构的影响有限。④最低工资上调过快，企业成本上升释放出大量劳动力，将使得D类人口增多，其中部分人口还可能转入地下经济、非法经济，成为没有合法身份的黑工，或者从事非法传销、走私、贩毒等活动，对社会发展不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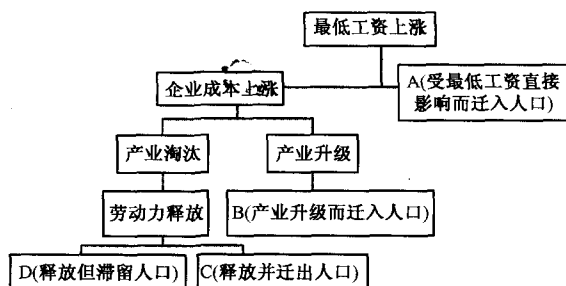


图1 因最低工资上涨而受影响的从业人员分类

2. 深圳最低工资与人口调控的实证分析

用深圳市的劳动人口Y做因变量。一个地区的劳动人口要考虑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地区

生产总值越大,就业机会越多,劳动人口也越多,因此,将人均 GDP 纳入自变量 (x_1)。另外要考虑这个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工资差距,如果该地区工资高于其他地区,则吸引劳动力进入,否则将使本地劳动力向外迁移,且考虑到深圳市年平均工资一直高于全国年平均工资,故将深圳市年平均工资与全国年平均工资之差作为一个自变量 (x_2)。将深圳市最低工资记为 x_3 。由于各变量量纲差距较大,故采用对数模型,以消除模型的异方差、共线性、非平稳等问题。

首先对 $\ln Y$ 和 $\ln x_1$, $\ln x_2$, $\ln x_3$ 作散点图,观察它们与 $\ln Y$ 之间的关系,所用的是各统计年鉴中深圳市 1993 ~ 2009 年的 17 年数据。图 2 左边散点图表明,劳动人口伴随着 GDP 的增长,经济发展,产量增加,其就业机会就会增多。中间散点图的形状,是由于深圳市平均工资与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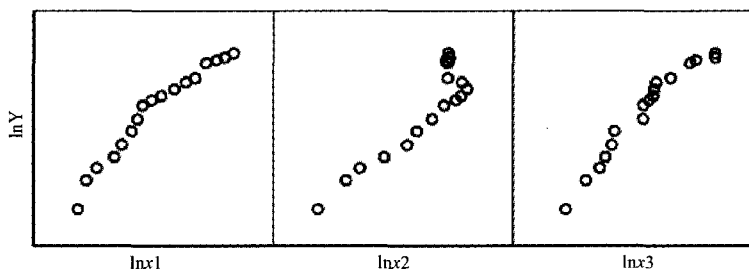


图 2 $\ln Y$ 与 $\ln x_1$ 、 $\ln x_2$ 、 $\ln x_3$ 关系的散点图

资料来源:《深圳统计年鉴 2010》、《中国统计年鉴 2010》、《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010》。

国平均工资相比有一定优势,从而促使深圳劳动人口不断增长,但这一优势近几年开始逐步减小。右边散点图表明,在最低工资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劳动人口的增量将逐渐放缓并下降。

为进一步分析人口与最低工资之间的关系,构建双对数线性回归模型。为了说明这三个因素对劳动人口的影响和变化趋势,我们对 1993 ~ 2009 年 17 年的数据做回归,考虑到最低工资对劳动人口的影响的滞后效应,以 $\ln Y$ 为因变量,以 $\ln x_1$ 、 $\ln x_2$ 、 $\ln x_3$ 以及滞后项 $\ln x_{2_1}$ 、 $\ln x_{2_2}$ 、 $\ln x_{3_1}$ 、 $\ln x_{3_2}$ 为自变量做回归,采用逐步法,结果如下:

$$\ln Y = 7.631 + 0.368 \ln x_1 + 0.382 \ln x_2 + 0.335 \ln x_3 - 0.313 \ln x_{3_2}$$

其中, $\ln x_{2_1}$ 、 $\ln x_{2_2}$ 、 $\ln x_{3_1}$ 的 t 检验不显著,因而未能进入模型,其余回归系数均显著,模型也通过了 F 检验。估计结果显示, $\ln x_1$ 增加一个单位, $\ln Y$ 平均增加 0.368 个单位,即深圳人均 GDP (x_1) 每增长 1%, 劳动人口增加 0.368%; $\ln x_2$ 增加一个单位, $\ln Y$ 平均增加 0.382 个单位,即平均工资差距 (x_2) 每减少 (增加) 1%, 劳动人口减少 (增加) 0.382%; $\ln x_3$ 每增加一个单位, $\ln Y$ 平均增长 0.335 个单位,即当期最低工资上涨 1%, 劳动人口平均上涨 0.335%; $\ln x_{3_2}$ 每增加一个单位, $\ln Y$ 平均减少 0.313 个单位,即当期最低工资上涨 1%, 会引起未来两期劳动人口下降 0.313%。这说明最低工资的上涨在短期内对劳动人口有迁入效应,在长期将会引起劳动人口规模的下降。可见,深圳最低工资目前还在促进劳动力迁入,但是这个效应正在减弱。

总之,深圳自实施最低工资制度以来,其平均工资和最低工资始终位于全国各大城市前列,为深圳人口和产业转型创造了制度条件。随着新一轮的产业升级和“腾笼换鸟”政策的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将促使深圳向人口规模适度 and 人口结构优化目标推进,政府应更加重视并充分利用最低工资制度这一重要工具。

参考文献:

- [1] 日本总务省统计研究所. 日本统计年鉴 (2009 年) [M]. 日本总务省统计局, 2010.
- [2] H. 钱纳里, S. 鲁宾逊, M. 赛尔奎因著, 吴奇译. 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22.
- [3] Gunnar Myrdal.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 [M].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1957.

[责任编辑 冯 乐]